

1924

一九二四年以前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
的萌芽

LA EKANTA SOCIALISMA MOVADO DE TAJVANO ĜIS 1924

邱士杰——著

一九二四年以前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邱士杰 著

La
Ekanta
Socialisma
Movado de
Tajvano
gis 1924

海峽學術出版社

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邱士杰

*

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

(發行人 黃溪南)

(116) 台北市景興路193號4樓之7 02-8663-2559〔電話〕 02-8663-2466〔傳真〕

電子郵件: sreview@ms47.hinet.net 劃撥帳號: 19389534 (戶名「海峽學術出版社」)

問津堂書局 台灣總經銷

(100) 台北市師大路165號 02-2367-7878〔電話〕 02-2367-7431〔傳真〕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書局門市批發

(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2號4樓 02-2219-2080〔電話〕 02-2219-2180〔傳真〕

邱士杰 排版

電子郵件: d97123006@ntu.edu.tw

輪速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02-2226-4796〔電話〕 02-2226-5250〔傳真〕

2009年10月初版 ISBN 978-986-6480-19-5〔平裝〕 定價420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

La Ekanta Socialisma Movado de Tajvano gis 1924

/邱士杰著. -- 初版. -- 臺北市：海峽學術，2009.10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6480-19-5 (平裝)

1. 社會主義 2. 社會運動史 3. 日據時期 3. 台灣

549.233

98017990

內容簡介

在風雷激盪的一九二〇年代，社會主義運動伴隨著一代運動者的誕生而萌芽於東亞海域中的台灣。他們是背叛皇國家庭的「灣生」日本少女、是掙扎於左右之間的島內社會運動家、是輾轉於東京與北京的安那其主義者、是從彰化前往莫斯科的黨人、是與「異端」共產黨接觸的馬克思主義青年、是前往東京參與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未來指導者，同時也是秘密集結於上海的台灣、日本、朝鮮與大陸各省過激派。他們活動、集結、潰散，並且再起，同時也發展出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最早的論述。這是一幅集中在一九二四年之前揮灑開來的畫卷，同時也是本研究將追尋、鉤沉，與細數的史像。

序一

林書揚

邱士杰君的勞作碩士論文另以《一九二四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為題而改寫成冊了。邀我一篇序，因時間上有所緊湊，請邱君容以數段感想以代。

按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殖民地，之所以每有反殖民主義運動，幾乎可說是物理上作用反作用的社會動態化，是不論兩造間的文明文化距離之大小的。但這類主要以民族群員為單位對象的壓迫方式（殖民方式）在資本帝國主義時段，因殖民本國社會性質之直接規定，（亦即金融寡佔的境外壓榨體制之設計或控御方式）是大同小異外，倒是因為被支配社會的本然性質，對新支配系統的反影響還是多樣態的。這一點只要看看東南亞一帶（如印尼、菲律賓、印度、緬甸、安南等），西歐海權年代時期所營造的殖民地群，和近中世以降封建大王朝在本洲歐陸上網羅的大小屬地，多屬血緣分支的支配實況的差異是甚為突顯的。當然，東、中歐（還包括部分南歐）的民族問題，最重要的是宗主國與屬地之間，宗教文化、血緣等民族要素的相近性與東南亞屬地和西歐支配者之間的異性之大是不言可喻的。若論殘忍性，更不可同日而語。至於十九世紀末葉，東海新起的日本帝國之領據台灣，情況之特殊性之一，在於被領治地雖屬大陸東陲一海島，但非屬南太平洋系島嶼群之一。在地緣政治上是大漢（大清）政治文化圈的一部分。雖屬後期主要移民團的屬性。但其時空條件背景下的島民精神面貌，若以文化範疇表中的位置關係說來，又非盡如歐亞洲其他殖民塊可列舉的小被大領——（雖然台灣一島小於日本列島），落後被治於先進——（雖日本殖民本國已大致現

代化，而台灣則尚未），台灣漢人移民社會仍在其大漢中華傳統意識（先驗認同）下，悍然以土製烏槍對抗日軍村田銃（日本新式軍工廠出品之新步槍）且以「日本蕃仔」蔑稱之。稱「日本蕃仔直目！」直說日本人種屬夷種，雙目僅能直視前方，攻時迂迴傍擊即可。以四十比一之慘重死傷代價與「日本蕃仔」斷斷續續周璇二十年。直至跨世紀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歐洲大戰爆發後的嘸吧年事件才全面落幕。接著隨著日本殖民本國之政治歐風化，在國內有政黨議會政治上軌，歐戰幾不費力則靠日英同盟而躍上戰勝大國之一，所謂「大正民主」開幕的新趨向出現。

其實，在所謂的「台灣抗日武鬥期」的廿年中（一八九五～一九一五），台日雙邊有關內外情勢的變化不少。二〇世紀初葉的文鬥新局勢出現的因素，除了上提歐戰結束後日本當局的殖民文治化的新策略是因也是果外，這段因果律的掌握恐怕少不得歐亞兩洲一些新因素的考察。而為了簡單化而尋出一個代表性特別重大的里程碑，則恐怕落在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紅黨勞農革命的成功及兩年後一九一九年第三國際的成立。及一次大戰後重建秩序為號召的國際聯盟的出現。以及新歷史條件下的戰後政治經濟思潮之舉世澎湃激盪。

先行日本自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後繼中國有武漢革命（一九一二），落在西歐主要大國產業革命及政治革命期之後。日本以後進資帝的姿態急起直追歐洲新局，而中國則有民間孫文救國運動，宮廷試探性的維新動向，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五四運動。日本更以脫亞入歐的心理渴望直入資本主義體制圈為其帝國主義新列強之一。中國則在熾烈的帝國列強競相侵蝕之危局下，孫文等一派趨向急進武鬥終於武漢一幕革命劇推倒了數千年封建，成立了亞洲首起的共和國。而回顧台灣，其艱辛的武力抗日二十年正好處在如上的歐、日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群的激烈競爭期，終於激出一個歐陸大戰，且戰爭更使社會體制中由封建到資本主義立憲共和制的移行大量風行，直到更見深刻的社會階級體制的內部矛盾的一次大爆發。終見俄羅斯革命的成功。這些歷史大戲都推出了嶄新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思想的大浪潮襲擊了舊思潮體制，使得二十世紀初葉的世界性氛圍急劇地罩住了中日兩國關係甚至包括台灣的抗殖民地新頁。直入地說，邱君注意到的一九二〇年～二四年的台灣，其對殖民本國的抵抗性已經超越了起事階段十九世紀末的傳統中華漢族優越論，再超

越了西歐牌民主共和市民革命論，而直追當時已成新史觀中所謂「最屬根源的歷史行爲」的生產階級系列論的社會運動範疇了。而以生產系列中的階級鬥爭論時期的運動意識，來著眼台灣近代化社會思潮發端之首項條目，邱君的定位意義正在於此，筆者甚感妥適。由此而論，所謂當年台灣的「資本主義論」實乃不過「階級乎、民族乎」論爭之附論而已。

蓋一種社會衝突的內部因素容有多端，但在多範圍的社會關係中最屬根源性者，亦即說得上歷史延續的唯一基本條件者——生存資料之集體生產外無他。其關係的定型定向以保證連續性乃所謂之生產關係之存在與維繫乃成為所有其他社會人際關係的本源基礎。其存、社會存，其亡、社會崩解，則其維繫任務乃成社會群體最高權柄之所在，史上唯委之國家最高權力體。至於群體史上出現的民族，乃如前述基於數種自然、文化因素的，群體史上的派生型態之一。雖然以其生於斯，長於斯的先驗認同的個、群體認同而成為歷史進程中一定時期的一要素，因而也會展現出時流中一段民族鬥爭期、民族進化期等，但依一般社會形成論言，階級系列之成型在先，而民族必須以經濟紐帶為形成因而出現（史上存在過的原始共產體，迄今仍未被呼為民族。）

有關民族與階級問題在學理上或尚不無紛爭，但以史實論二十世紀以降歷史唯物論者常以「社會主義內容，民族主義形式」為理論處理或運動實踐上的原則。是有其道理的。以邱君著作而言，在論台灣左翼運動史的論述中以「民族主義乎，階級鬥爭乎的論爭」為首章是十分自然的。

總之，一個時代的政治鬥爭，因「政治」本身的複雜性與苛烈性，從社會客觀到成員主觀反映的迂迴性多樣性，往往表現在運動先行期的記錄中，是十分無奈的。特別在主觀條件上往往遭到難以一時克服的早熟性或不成熟性、邊緣性等，使得那段先行期中的少數里程碑一直是有幾分蒼涼甚至悲戚感的。但無論如何，有先行者的，那怕是孤單身影輓動著的社會，還是有方向的，亦即有未來的社會。在這意義上邱君勞作的意義之重大還是不會被埋沒的。

至於進入階級鬥爭期後的無政府主義 VS 共產主義，當時或以日外語安那其主義與布爾塞維克主義呼之，其出現更屬難予避免。

蓋自十九世紀中，馬克思與普魯東之間《哲學的貧困》與《貧困的哲學》

的論爭起，由哲學論爭到組織路線運動路線之間的激烈論爭，乃眾所周知者。無政府主義者總被一般群眾認為多一分哲學的浪漫，也多一點組織和運動的衝動。也許是前十九世紀中葉起，無政府主義在殖民地、屬地間的發展讓人覺得時而大於急於一般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馬克思共產主義的聲勢。說不定屬地、殖民地的重層權力結構使得被壓迫群眾的權力嫌惡感更易凝結。更何況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需要一定堅實度的勞工階級為社會心理層的基礎。我們可如此設想，一個屬地、殖民地在具有一定成熟度的產業工人階級存在之前，它的知識人、農村小地主、小工商人等可能是未來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作用下被編入「小資產階級」的，對現狀已具有一定反叛心態者，較有可能投入的，多半是無政府主義，以自由結合為主旨的安那其主義團體。要不是歷史發展的曲折性，出了列寧一班運動者，在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科學性上面鍛造出帝國主義論和勞農蘇維埃制的戰鬥性，第一國際時期以來巴枯寧主義的流域大概還會擴張一點。而在大情勢中釘立了方向指示牌的兩大歷史事件，是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革命和一九一九年的第三國際的成立。及稍前中國武漢革命的成功，日本勞動運動初發與反閥族政治的護憲運動普選運動，漸入左翼思潮激盪年代，特別高等警察制度的成立等，這些都是直接間接影響武裝抗日頓挫後的，二〇年代台灣社運時代的承啓契機。也是邱君研究的起點。

當年台灣海外留學生有兩大走向圖。一為留日，另一為留中國。前者屬法理上的殖民本國，後者是被割離不久的精神母國。心知故鄉的殖民地抗暴運動，在父兄等缺少日式現代教育的年齡層者的推動下，已遇上難以跨越的瓶頸的台灣留學生們本身，除了民族主義派與階級鬥爭派的第一層分歧外，也少不得安那其與布爾塞維克的立場之分。但在實際運動上，大致尚能維持那一時代環境下的聯合抗日，雖說不算有多堅固，說得上也是先行期中的必然現象。如初期的一些思想團體——如連溫卿領導下的黑色青年同盟甚至中期後周合源等人為主的孤魂聯盟，其初期成員中往往包含有一些紅色青年。其實，兩者間在哲學上的爭論雖然極其尖銳，甚至「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極反現象」「極端的權力主義者」等的相互定位論都出現。記得恩格斯帶一點規勸的話：「讓國家像一朵花過它的盛開期而自然掉落吧。」

邱君著述中有一段連溫卿於一九二四年訪日本東京參觀五一勞動節的示

威行列文字。連溫卿受到極大的感動和衝擊，對勞動者行列通過上野公園山麓時的情景，用簡單動人的筆調描繪過。文字是用當年盛行的台灣白話文。他描述隊伍的最前頭是黑色旗子的隊伍，接著是紅色旗隊。他的評語只是淡淡地：「黑色旗是主張自由聯合的，紅色旗是主張統一合併的。」說得上是語短意長，也反映了當年連氏所處運動環境的一定氛圍。另外，他還簡潔地但感動地提到歌聲、口號聲、萬歲聲，就是不曾介紹到當日 MayDay 歌的歌詞。讓人有一點缺落感。當然，有一種可能性，可能剛好連氏站著的那一段沒有唱歌，第二種可能是當天沒有唱歌（但明明說「雄大的歌聲」），為甚麼連氏於一九二四年東京 MayDay 的參觀日記中獨漏歌詞的介紹？

顯然，當天的示威行列是黑紅兩派工會的連合活動。隊伍的行進序列是安那其在前，布爾塞維克在後。而歌是唱紅色的？而連氏是否以一絲苦笑處理了他在日記中的目擊文？

筆者稍帶莞爾笑意翻了一些文獻。據記載，日本的五一示威第一次是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連氏遇到的，如果二三年沒有中斷，應是第三次。歌已經有了。是東京勞動組會議認定的。全部五首。曲調套以「步兵歌」調。我親自聽到已故周合源老先生唱過。之所以沒有忌諱軍歌調，大概是因為當時日本左派沒有像中國聶耳氏那樣的人材，再說日本全國皆兵，兵源多來自農村青年、城市勞動者，工會會員應人皆熟知歌調，不必另行練唱，隨時開口唱新詞毫無困難。「反正每次的示威，都有反軍、反戰的口號嘛。」周老笑著說。

我翻看昭和九年版森戶辰男監修的社會科學辭典。東京勞動組會議的 MayDay 歌全五首都有了。我不知道這就是連溫卿於一九二四年聽到（或沒有聽到）的歌，反正這就是當年身穿滿身油漬的工作衣勞動者們拉開嗓門唱出的「文句」，是他們的思想動員的努力的成果之一，試著中譯下來。也許，對邱君勞作的小小一點補白！

一、聽到嗎，
萬國的勞動者。
搖撼天地的，
MayDay 聲！

示威者齊一的，
步伐聲浪。
預告未來的，
吶喊聲浪！

二、放棄你負的
工作部署。
覺醒自己的
生命價值！
二十四小時的
全休日，
為直衝社會的虛偽與壓迫！

三、長期受盡
剝削苦難，
無產的人民
蹶起蹶起！
今日二十四小時
階級戰已經來臨了！

四、起來吧勞動者，
發奮起來吧！
把被搶走的
生產大業，
以正義的手臂
奮還吧！
彼等苦守
能算甚麼！

五、我們步武的

最前衛

迎風高舉著

自由旗！

保衛它 MayDay 勞動者！

保衛它 MayDay 勞動者！

二〇〇九年三月

序二：馬及馬及的靈藥

唐 曙

1974 年 6 月，加州州立大學的歷史學副教授羅伯特·布雷奇（Robert Blackey）在《現代非洲研究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法農與卡布拉：一個非洲革命理論的比較》（Fanon and Cabral: a Contrast i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for Africa）¹的文章。文章從非洲革命的性質、社會階級結構、黨的組織與領導權、革命的暴力以及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等角度，比較了兩人的革命理論。

1974 年對非洲而言是個重要的年份之一，因為這一年的 4 月，葡萄牙國內發生了被稱為「康乃馨革命」的軍事政變，由基層青年軍官所組成的「軍隊運動」（MFA）推翻了執政逾五十年的「新國家」法西斯獨裁政權。這場政變也使得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幾內亞比紹、安哥拉、莫三比克、聖多美與普林斯比以及維德角同時獨立。1961 年至 1974 年間葡萄牙發動非洲殖民戰爭，企圖消滅各殖民地的反抗軍，這些反抗軍包括了卡布拉（Amilcar Cabral）所領導的「幾內亞與維德角獨立非洲黨」（PAIGC）、內托（Agostinho Neto）所領導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工黨」（MPLA）、孟德連（Eduardo Mondlane）所領導的「莫三比克解放陣線」（FRELIMO）以及卡斯塔（Manuel Pinto da Costa）所領導的「聖多美與普林斯比解放運動——社會民主黨」，這些反抗軍大多從 1950 年代就開始組建，除了卡布拉的 PAIGC 之外，其他都是旗幟鮮明的社會主義組織。這些反抗軍頑強地與葡萄牙殖民勢力持久戰鬥，拖垮了殖民當局的經濟與政治，也瓦

¹ Robert Blackey, "Fanon and Cabral: A Contrast i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for Afric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2, no. 2 (1974): 191-209.

解了殖民軍隊的士氣，「軍隊運動」(MFA)的政變行動正是這場歷久反抗的直接結果。

按照當時的時空氣氛來說，全面開始探討和總結葡萄牙殖民歷史和反殖民運動是絕對必要而且及時的，但布雷奇的文章卻耐人尋味地只做了卡布拉和法農的比較。在這篇有關兩人非洲革命理論的文章中，他較多地談到了兩個人之間的差異。

在非洲革命的性質方面，他指出了兩個人不同的革命氣質：法農強調獨立革命是被殖民者和殖民地社會重生的過程，而卡布拉則強調獨立革命的具體目標、獨立後如何捍衛革命成果；²他提到了卡布拉對格瓦拉「游擊中心」的反對以及兩人雖都傾向社會主義，但都自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³

在殖民地社會的階級結構方面，布雷奇比較了兩人對於農民的革命信心問題，法農對農民充滿信心，但卡布拉則對這個階級的革命性有所保留；法農認為殖民地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一樣是既得利益者，但卡布拉則認為殖民地工人不如歐洲工人，是「小無產階級」；法農完全否定流氓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卡布拉則將流氓無產階級做了區分，認為新從農村流浪進都市流氓無產階級具有潛在的革命性；法農認為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對革命而言是無用的，但把它稱為「小資產階級」的卡布拉則認為它由於受過歐式教育、為殖民政府服務但卻又處於社會的夾縫中，所以會感到痛苦與挫折，這將會引導它重新思考並透過群眾的革命運動來確認自己的社會定位。⁴

在黨的組織與領導權方面，法農主張革命精英應從外部領導農民，適時地引導農民的革命能量，卡布拉則認為革命的精英應與農民共同學習成長，才能有發揮領導作用。法農反對一黨專權，卡布拉則認為在落後的殖民地，只有全國性的黨才能發揮真正的民族解放的功能，才能集中力量強而有力地對抗殖民勢力。⁵

在革命的暴力方面，法農認為殖民的暴力只能用更堅決的暴力回應，透過革命的暴力，群眾才能了解真實的社會。卡布拉除了強調革命暴力是對殖民

² Blackey, 193-195.

³ Blackey, 195.

⁴ Blackey, 197-202.

⁵ Blackey, 202-204.

地壓迫的會應外，並沒有特別討論革命暴力的性質，但他卻強調了由於幾內亞比紹沒有向阿爾及利亞一樣大量的殖民母國移民，所以不需要採取恐怖主義攻擊的形式。⁶

有關文化在革命中的作用方面，布雷奇認為兩人都視文化為人民在解放鬥爭中自我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雙方也提出了殖民者是如何地透過對被殖民者日常的壓迫來消滅其文化。

布雷奇的文章，運用了西方學術界慣用的解釋系統與範疇歸類，將所謂的「非洲革命理論」，透過法農和卡布拉的論述與差異確定下來。這裡形成了一種「和諧」與「矛盾」。「和諧」的是兩人的論述可以透過這樣的學術範式得到西方的理解和再分析，「矛盾」的是「非洲革命理論」在比較之後，在同樣的命題下，卻產生相互「矛盾」的結果。「和諧」使得非洲革命的成功得到了分析的合理前提，「矛盾」則得出了非洲革命後的內戰和經濟破敗的必然性，西方的理性主義，再度在學術上獲得全知的勝利！但真的是這樣嗎？

布雷奇的文章有意識地選擇了與西方學術界語言較能相通的兩位知識份子的革命論述，而且強調法農與卡布拉雖然對社會主義心嚮往之，但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員，儘管他們運用馬列主義對各自的社會都進行了深刻的分析。這種強調在冷戰對峙時代的非洲是有其用意的。

1959 年古巴革命成功時，卡斯特羅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內承認這個革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1961 年剛果總理盧蒙巴被丹加丹省分裂份子沖伯處決的原因，就是因為他不該在比利時殖民勢力支持丹加丹省分裂獨立時，向美國求援失敗後，轉向蘇聯求助。這引起了美國的恐慌，決定要置他於死地。這樣的警惕與教訓都是所有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以及反殖民的抵抗力量必須慎重對待的。與卡布拉相比，法農並沒有像本·貝拉所領導的阿爾及利亞解放陣線（FLN）那樣深刻地捲入解放戰爭中。做為一個革命的宣傳者，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更像是回應西方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界的聲明，從他的第一章與薩特 1961 年版序言都以暴力為主題，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卡布拉在幾內亞比紹的革命實踐，對西方學術界而言，具有一定的「純潔

⁶ Blackey, 204-206.

性」。他認為幾內亞比紹的革命不必使用極端的恐怖主義暴力（不是因為他拒絕，而是因為用不上），他也在戰術上堅持只對軍事設施進行襲擊，他堅持古巴的革命援助只能是醫療和教育，古巴不能直接參加戰鬥，他反對格瓦拉的「游擊中心主義」。⁷除了「一黨專政」外，這些原則都給西方學術界提供了一個「小而美」的解放戰爭典範，不必疲於奔命地去爭論暴力使用的原則性問題。然而，也正是同一個卡布拉，在 1965 年哈瓦那所舉辦的亞非拉國際團結會議上，和格瓦拉遙相呼應地闡述了他的「新人」思想，並共同支持了格瓦拉所提出的要建立「第二個、第三個越南」的呼籲。

布雷奇文章的選擇性還在於忽略了葡萄牙殖民地其他抵抗力量的社會分析、政治方針與革命策略，這種忽略使得有關非洲革命理論缺少了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對這個部分略而不談，就無法解釋為何這些殖民地在取得獨立之後，又陷入了長期的內戰。

冷戰對峙是第三世界反帝革命解放運動如此複雜的根本原因之一。微弱而新獨立的殖民地爲了在複雜的國際夾縫中生存下來，不得不謹慎面對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這和 1920 年代殖民地知識份子因十月革命勝利而充滿解放信心，看來似乎不同，但這只是時空背景因素影響下的、表面的不同，對於反對這個帝國主義宰制的認識，卻沒有不同。到了非洲大陸革命運動高漲時期，恩克魯瑪和卡布拉甚至進一步提出了沒有消滅新殖民主義就不算真正獨立的見解。

所以，布雷奇指出的法農和卡布拉之間的差異，其實不是差異，而是非洲革命整體的一部分，就像內托、孟德連、卡斯塔、本·貝拉、盧蒙巴、曼德拉、薩姆·努喬馬（Sam Nujoma）、格瓦拉和卡斯特羅一樣，都是非洲大陸革命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這些不可分割的整體反映了使理論聯繫於實際的努力。而直面種種困難與問題的這些革命者則是唯一使這一聯繫成爲可能的媒介。

任何一個殖民地解放運動都要面對一個複雜的文化省思：「文明先進」、「有效率」的野蠻殖民體制的一切在什麼意義上是值得學習或不值得學習的

⁷ 見紀錄片：JIHAN EL-TAHRI, *CUBA: AN AFRICAN ODYSSEY* (2007).

呢？十九世紀主張黑人「自治」的思想家阿弗里卡納斯·霍頓(Africanus Horton)就認為應該要向殖民者學習，並且要透過積極的學習讓殖民者認同，進而向殖民者證明黑人是可自治的，霍頓甚至還隨英軍參加了兩次對西非阿散蒂王國的戰爭。⁸但有更大的一群人卻選擇了負隅頑抗。1905至1907年間，德屬東非的黑人由於不滿殖民當局強迫栽種棉花並課徵棉花稅，憤而起義。這些人只有獵槍、長矛和弓箭做為武器，宣稱蛇神附體的巫師恩格瓦列(Kinjikitile Ngwale)於是泡製了稱為「馬及馬及」的靈藥，可以將敵人的子彈變成清水，黑人因此士氣大振，奮勇抗擊殖民軍隊。三年奮戰間，黑人死亡人數竟高達二、三十萬人之眾。⁹德國的人類學家後來還特別研究了這種「靈藥」，他們發現其中的成分只有蓖麻油和黍稷的種子而已。按理講，只要一上了戰場，子彈不能變成清水，起義軍勢必瓦解，是甚麼讓這些黑人前仆後繼地抵抗了三年呢？

1906年，英國人為了要逼使更多黑人到金礦區當礦工，決定向自給自足的祖魯族課徵人頭稅每人1英鎊，這對缺乏現金的祖魯人來講根本就是奴役，為了拒繳人頭稅，祖魯酋長邦巴薩(Bambatha)帶領族人抗稅，後來為英軍所敗，死於多波森林，但族人多不相信他已陣亡，有人甚至認為他已經變成了多波森林的守護神了。¹⁰

從西方理性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落後野蠻的黑人所做的抵抗都是荒謬而且毫無意義的，他們這種以卵擊石的自殺暴動，再次證明了他們的愚蠢，也再次證明了殖民的白人肩上那種「文明開化」重任的必要性。但西方理性的殖民者不了解的是：馬及馬吉的靈藥並不在於它的成分，邦巴薩的生死與否並不在於梟首示眾數十年，關鍵在於被殖民、被壓迫的人們透過這種看似迷信荒唐的儀式，找到了源於自身文化的認同和戰鬥的位置，所以尼日利亞小說家齊努亞·阿切貝才能不卑不亢地在他的小說《分崩離析》(*Things fall apart*)中，透過愛哲烏魯勇敢地展現他部落的全貌，也才能不畏冷戰肅殺的政

⁸ 有關霍頓生平，見：Christopher Fyfe, *Africanus Horton, 1835-1883: West African Scientist and Patrio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⁹ Robert Gellately and Ben Kiernan, ed. *The Specter of Genocide: Mass Mu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¹⁰ K.G. Gillings, "The Bambata Rebellion of 1906: Nkandla Operations and the Battle of Mome Gorge, 10 June 1906," *Military History Journal* 8, no. 1, <http://samilitaryhistory.org/vol081kg.html> (accessed 18 April, 2009).